

古史辨

第五冊

顧頡剛 編著

海南出版社

古史辨 第五冊

顧頡剛編著

顧廷龍題端

劉 序

古史辨第五冊是專收近年來討論今古文問題同陰陽五行說起源的總集。顏剛先生以爲我是好研究這兩個問題的，在一年以前就要我作序。耽誤到現在，不能不交卷了，預備花上兩晚的工夫來寫一點年來研究上古史的意見。近來同朋友們談話，凡是非研究上古史者對於研究上古史者每每下一種很苛刻的考語。他們不外是說：「研究上古史是猜謎」。或者說：「研究上古史者所得的結論沒有不對的，而同時也就是沒有一個是對的」。諸如此類，簡直是有意同研究上古史者爲難。若把這些考語仔細校量一番，祇證明非研究上古史者的眼紅而已。說起來也真好笑，近十年中地底發現的新材料總是歸入上古史範圍爲多。非研究上古史者看來，真有點不舒服。加以研究上古史者好提出問題，左是一個今古文經說，右又是一個陰陽五行說起源，討論的討論，打架的打架，爭爭吵吵，鬧到不亦樂乎。非研究上古史者冷眼看着真是垂涎三尺，不能不想一種對策，沒辦法，祇好挖苦一頓罷了。實在說起來，研究上古史者所解決的問題有好多是有價值的。前如閻百詩，惠定宇之於僞古文尚書；近如王靜安師之考殷代先公先王，都是確切不移，誰敢說一個不字？至於我們的工作，是秉承諸先生的遺教而擴充的，自信也有幾分成就，何至於等如猜謎？本來研究上古史不是一件容易事，攬總祇有這一點點材料，叫人引用起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外行人看來真覺得目迷五色。但是這不能怪研究上古史的人不是。有許多上古史上的問題本來不能馬上解決，務必有許多學者提出假設，然後因新材料而逐漸得到解決，這是做學問必經的階段。如果把所提出的假設作爲已解決的問題來看，自然覺得不能切理饜心。至於評定假設，要看合理不合理，而估計解決的問題，那麼要問可信不可信。這是我們考覈學問時必須的常識。

研究歷史同旁的科學不同，無論近世史或上古史，所留存的史料同已過去的史蹟相比，自然不知相差多少倍。想在這些有限的史料中探求幾百乃至幾千年前的史蹟變遷，自然覺得捉襟而肘見。所以歷史家的論斷可以因偏以見全，因小以見大，這是歷史家應有的本領。而且歷史家不僅在考訂史料同論次史蹟兩方面下工夫，尤貴乎能有一貫的方法，作論史的骨幹。近來學者好言用唯物史觀來創造新史，這也是螳臂當車的想頭。馬克斯輩發現唯物史觀的時候所用的材料，不外乎西歐之部。如果拿來解析世界史總嫌不夠。說起世界史來，不論時間，空間，

人口，材料四方面，用那一種做標準，都可以說中國史是佔第一位的。我們祇可用人家研究歷史的方法來作參考，而最緊要的還是從中國歷史上自己鉤稽出一種歷史方法論來，那才是真正的辦法。我們即使承認唯物史觀是很有價值的歷史方法論，然決不是一種不可變動的金科玉律；補苴罅漏乃是後學者的責任，何況我們有那麼多的史料做後盾呢？而且馬克斯輩所發見的方法，其實都是社會學的而不是歷史學的。從前有一位學者拿一種比方來說明社會學的方法同歷史學的方法的不同。他說：社會學者的對象同歷史學者的對象是一樣的，好比同是一堆雜色玻璃片，紅的紅，綠的綠，黃的黃，顏色不一。社會學者把牠拿來放在鍋爐子裏溶化了，變成一種混和的顏色。這就是說社會學者對於材料的要求，祇取其共通現象而不顧牠的特殊之點。歷史學者就大不同了。他們把這一堆雜色玻璃片不放在鍋爐子裏，把牠放在棹子上，或者旁的地方，五顏六色，煞是好看。他們要就其自然的趨勢，擺布出各種的紋樣來。除掉土塊木屑不是真正的材料不要者以外，凡是玻璃決不肯放棄。假定其中缺少了一塊，也決不師心自用，無端捏造，但是不求共通現象。因為嚴格的說來，從古至今的史實就沒有一件是相同的。如果司馬光資治通鑑把淝水之戰同赤壁之戰一樣的寫法，那就該打手掌心了。社會學者說歷史上的戰爭都是以經濟作背景，例如荒年之類。然而我又敢說，黃巢造反同洪楊之亂決不止一個原因。假定一位歷史家祇知道寫出黃巢造反同洪楊之亂的經濟背景，還不算希奇。最要的，還在寫出這兩件事中許多不同的原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歷史上的事實也是一樣。譬如寫一部小說，務必把其中人物的個性竭力描摹。如果曹雪芹作小說時，把薛寶釵同林黛玉寫成一鼻孔出氣，紅樓夢豈不是早該燒掉嗎。社會學者所以要求出社會的共通現象的緣故，是在推求以前社會所以變遷之故，同今後社會所以改進之道。從前中國沒有社會學，歷史家就兼這個差使。到了梁任公師作中國歷史研究法時還是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廣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所謂「求得因果」，「以為資鑑」，都是社會學者的事。現在的歷史家不負這個責任了。我以為研究歷史應該分兩層工作：第一步是考訂史料，純粹的是科學方法；第二步是論次史蹟，於是產生所謂歷史方法了。這種選擇史料和編比史料，是歷史家的專責。這種方法，是接近於文學的。不過文學以想象成分居多，而歷史家務必尊重事實罷了。所以歷史這樣東西，就是人類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在敘述過去人類力量的表現，和各時代的特殊現象；及各民族的特性，和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因此，歷史家不止看重客觀事實，同時還要有主觀的審擇同時代精神。而歷史方法之接近文學，就在乎此。再拿擺布雜色玻璃作比，雖然有顏色同數目的限制，而擺布者仍舊可以自出心裁，前後一貫，作出一種與眾不同的事業來。所以歷史家有了共同的歷史方法以外，還可以自創歷史哲學，也就是這個緣故。近年西洋歷史家不乏此類人物，求之中國，自漢以後很少人够得上這種資格的。說

到此地，可以言歸正傳了。

上古史的年代，嚴格說起來應該從商代直數到東漢末年。就其中再畫分三個時期：商代爲一期，周初到戰國末年爲一期，秦、漢兩代爲一期。就其中可靠之文獻言，前後不下千六百年左右。在這時期以前的歷史，除非考古學者今後在地底有更新的發現以外，我們實在再沒有勇氣來信從前人捏造的傳說。從康長素先生數到顧頡剛先生，所有的工作都是揭穿這些傳說的背景，惹得許多人對他們懷疑。到了現在，事實給我們的證明一天比一天多，康、顧兩先生的功績是無可否認了。可以拿一種很簡單的現象來說：在詩書的時代，祇有夏禹的傳說；到了孔子的時代，就有了堯、舜；到了戰國中葉以後才有黃帝，神農，伏羲；西漢初年，便有帝繫姓中各種人物出現；到了東漢以後，如劉歆的世經，不知作者的易通卦驗，春秋元命苞，王符的五德志，志氏姓，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之類，時代拉得更古，名目也層出不窮。這樣的東西，分明是後人捏造的假歷史。假定現在有人提到盤古氏開天，學者們總不會相信吧？但是世本同山海經上共有的蚩尤作兵伐黃帝一句話，雖是我們隊裏的右翼健將唐立先生，也要說：「蚩尤始制而黃帝效之」，像煞他老先生親眼看見似的。可見傳說出來越晚，時代拉得越早，而相信的人也越少。上古史的材料最麻煩的就是其中夾雜着傳說成分太多。我們知道詩書及易經中都夾雜着傳說，焉知金文及甲骨文中沒有很古很古的傳說在內呢？不過我們的知識還不够認識這些傳說而已。詩，書，易以下的書，其中夾雜着許多傳說資料既是公認的事實，如果我們真想爲中國上古史謀出路的話，便應該下決心把這些傳說成分提煉出來，然後真切正確的上古史纔會發現。光是一味雜湊，話雖說得暢快，恐怕距離事實太遠了。而且上古史中傳說成分的構成並不是枝枝節節的，這中間有他的歷史哲學在。我們如果真要研究這些傳說，非得求出他們造謠的用意和方法不可。說到這兒，不能不佩服康長素的偉績了。康老先生所做的孔子改制考，把孔、墨以下幾位哲人的苦心孤詣和盤托出。他雖自命爲今文學家，但這種工作已經拆穿今文家的西洋鏡而有餘了。至於他的新學僞經考，對古文家的陣地下一場總攻擊，更有價值。於是乎我們才知道自孔子以下直到劉歆，其間學者很少有幾個人沒有造過謠的。而且「現存的古書莫非漢人所編定，現存的古事莫不經漢人的排比；而漢代是一個通經致用的時代，爲謀他們應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犧牲古書，古事，來遷就他自己，所以漢學是攪亂史蹟的大本營。」那麼這種攪亂史蹟的根本方略如何呢？假定我們沒有考究出這種方略的眉目來，就很難分析這些混亂史蹟的底蘊了。顧頡剛先生在四年前作了一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這才知道漢人攪亂史蹟的根本方略原來是如此。這不能不佩服顧頡剛先生的心靈手敏了。在這方略裏面，應該分兩層來討論。

第一，陰陽五行說起源。

第二，今古文經說之爭。

我覺得陰陽五行說的起源尤其重要，因為今古文之爭是拿這個問題作中心的。假定把陰陽五行說的起源和發展弄清楚了，今古文學的重心算是定了。兩漢學術界的大本營是札在儒家身上，然而兩漢的儒家決非春秋戰國時的儒家，他們原來是陰陽五行家同儒家的結合體。這派學者最初開創的是鄒衍，集大成的是董仲舒。洪範一篇，就是他們的重要經典。他們的力量在秦漢之間真有不可一世之概。像秦始皇，漢武帝，這樣雄才大略，都要上他們的當。秦始皇叫他們騙出去巡狩方嶽，因此死在路上。漢武帝聽從他們的話，巴巴的從陝西跑到山東去行那封禪之禮。而且他們還有一樁最大的本領，就是善變。他們看看儒家不得勢了，就會同旁的一家結合起來。在西漢初年黃老之學最盛的時候，他們也會同這一派人暗中勾結作祟。你看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又把陰陽家放在六家之首，似乎這位老學究也有一點偏心。到了後來，儒家離開民衆更遠了，他就真的勾結起道家來，造成東漢以後的道教。其善變一至於此。你瞧是什麼緣故呢？事情說來甚為簡單，就是中國人的宗教思想從中作怪罷了。凡是剛開化的民族，總是需要宗教來領導的。中國從古以來就沒有正式的宗教。而宗教上重要的力量，全靠信仰作背景。這種力量務必能統率知識階級同非知識階級才成，陰陽五行家在秦漢之間所以能大行者就在乎此。因為陰陽五行家提出「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種種名目，使一般民衆感覺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的畏懼；而同時一般學者又覺得這裏面也有談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道大經的哲學，如果不順他，便「無以為天下綱紀」。因此兩得其便，就算他們的學說最時髦了！講到這裏，好譚唯物史觀的學者必定又說：「慢來！還有——還有經濟的背景呢！」被這一問，下邊我就不敢亂說了，留待您細細推敲吧！陰陽五行學說在兩漢既然有這樣大的力量，而今古文之爭就因此起來。今古文之分，在骨子裏就因陰陽五行說之不同，復因此而產生政制及禮制的不同，然後產生經本同經說的不同。假定研究今古文而把捉不到這一點，決不會有解決的希望。七年以前，我在清華學校研究院讀書的那幾年，每當花晨月夕，同顏虛心 侯芸圻兩位先生出來散步的時候，總時常談到今古文問題，當時就想從洪範起，依次尚書大傳，春秋繁露，白虎通，漢書五行志，然後數到諸經的經本和經說，以及先秦諸子，漢代緯書，同史記漢書中各處提到陰陽五行問題的地方，都要把牠抽繹出來，下一番細工夫。那知畢業以後，為稻粱之謀，奔走四方，就把這件事擱起來了。後來有一年暑假從天津回到北平，同吳子馨先生到燕京大學去訪顧頡剛先生。這是我第一次見顧先生，他一見便引為同道，把他所做的工作都拿來給我瞧。我還記得其中有一件是把禮記月令拿來同夏小正，呂覽十二紀，逸周書時訓解，淮南子時則訓等列表作比較研究。這樣的工作雖然前人也有過，如同元 吳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清 曹仁虎的七十二候考，俞樾的七十二候考，羅以智的七十二候表，但是他們的眼光同方法遠不及顧先生。當時我就想到，我所要做的工作顧先生必定

都已想到，或許都已經做過。再過幾個月，我到河南去。顧先生遠道寄我一書，就是他的不朽大著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讀了之後，才知道今古文的問題已給顧先生捉住了重心，我們無論如何追不上了，祇好讓他獨步。於是我就轉向研究甲骨金文的路上去。

太史公作史記的時候，距離我們兩千多年。照理，他所看見的先秦史料應該比我們多得許多。然而大謬不然。除掉世本一書亡佚之外，太史公所用的材料，不外乎詩，書，國語，國策，及左傳中的材料。夏殷本紀大概是根據世本作的，也許還有大宛傳贊中所提到的禹本紀。此外太史公大概看見一些周代人作的譜牒，如所謂周譜，春秋歷譜牒之類，因此作出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這三篇大作來。至於周代初年的史事，除掉根據詩書兩種以外，就沒有多少了。平王以後，是根據國語以下諸書的。尤可怪者，自成康以後，直到東遷，幾百年間，史料異常貧乏。即使拿列國世家來說，凡是隱公元年以前的史實，幾乎篇篇一例，簡單非凡。西周幾百年間留下的史料少到這般田地，其中必大有緣故。就是說東周以下的吧，史記所載也不外國語，國策，及左傳所記。假定一旦不幸，把史記亡佚掉，我們也可以從國語以下諸書中鉤稽出大半來。戰國人所謂楚之檣杵，晉之乘，以及宋春秋，齊春秋，燕春秋，百國春秋之類，難道太史公都沒有看見嗎？真的就一點也不採嗎？想必其中也別有道理。據我看來，西周之時就沒有寫定的史書。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也是後人瞎說。像尚書中大誥，洛誥，顧命之類，都是偶然留下來的公文書札。東周以後的學者把牠配搭起來，又雜湊上像盤庚，召誥一類東西，比較起來，在當時算是有系統的材料。孔子看看旁的傳說比這一個更不行，於是乎很感慨的說：「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現在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在孔子看來恐怕又是不雅之言了——我想在孔子的時候，必定還有許多不雅之言，叫孔老先生瞧不起，而其中保存着許多好史料的東西在。從孔子直到太史公作史記，又是幾百年，我們中國人已經受孔老先生的教化好久了，所以太史公對於薦紳先生難言之的野史也不採用。不要說旁的，例如太史公所沒有見的竹書紀年，其中就有許多地方與史記不同，甚至其中有啓殺益的故事。雖然啓殺益的故事也不見得一定可信，但是可以想到現在上古史上的每樁事，在先秦必有好幾種傳說，例如萬章問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之類。後來這些雜說被正統派一個一個的打倒，祇留下現在人所看見的一派話。可見思想界上的權威真利害，他們可以不把真消息告訴我們，而同時還要叫我們看不見旁的假消息，光光的信他們一派人的胡謔。由此說來，我們不是恨上古史上的傳說太多，却是恨上古史上的傳說太少了。西周以前的史料既然這樣缺乏，而我們所知道的又僅僅是秦漢以後的儒者們所傳的故事。說到東周以後的史事，也祇有在他們所承認的幾部書裏翻來覆去的輾轉傳述。那末我們研究上古史的人唯一的辦法，祇有向殷墟書契同兩周金文上開擴出新境地來了。中國的上古史要分兩方面做：一方面

整理舊史中的系統；另一方面要從新得的材料中做成新史的骨幹。我以為研究上古史的人應該作出兩部書來：

第一部，中國上古史引論。

第二部，中國上古史大綱。

整理舊史的系統，第一，要先把構成上古史底理論的宗派弄清楚，這件事有顧頡剛先生這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把底子也打好了；以後就是有補正他的地方，也很有限的。第二，要把舊史的年代世系弄清楚，這件事顧先生也已經幹得很好了；而且這步工作也非他莫辦的。頡剛先生前在燕京大學作的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甲編，就是絕好的典型。他在這講義的開頭就說：『這甲編是講中國上古史中的天子諸侯繼承的舊系統的，分為上下兩部份：上一部份講夏以前的舊系統，下一部份講夏以後的舊系統』。這部講義把世系是講得很清楚了，年代是同世系連帶解決的，在他這講義上略為補充，也算成功了。第三，要數到上古史傳說中的地域觀念了。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裏面有好幾個系統。例如山海經，穆天子傳，同鄒衍的赤縣神州之談，都與正統派的傳說各不相謀。可見傳說中的地理觀念，還沒有經儒家來澄清一下子，所以有這樣的不同系統。就說正統派之中，堯典，禹貢，同漢書地理志的分野，也不相謀。對於古代地理的問題，顧頡剛，錢賓四兩位先生皆以全力對付。尤可佩服者，就是顧先生的州與嶽，同錢先生的三苗疆域考。如果像這樣的文章多出來幾篇，古代地理的傳說系統也會弄明白的。第四是上古史中的氏族觀念，這也是一個難題。左傳裏說到各國的姓氏，用地理來考校，大體都很合當的。其中惟有嬴姓之國太離奇了。秦是西方民族，同東方諸國習慣風俗都不相同。史記對於秦的姓氏有自相牴牾的地方。開頭說舜賜伯翳為嬴姓；中間說『仲衍之後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末了又說『秦之先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如果秦之先本為嬴姓是真的話，那秦人非是東方民族不可，因為江淮之間姓嬴的國太多了。例如徐，葛，江，黃，而且黃國之姓嬴還有金文上的證據。上述諸國之姓嬴既無可否認，同時秦人似乎非西方之民不可，賜姓之說到底可信了，不過是周人所賜而已。古代國家的姓氏，必定也有經過漢人的編派。你看潛夫論的志氏姓，就可明白。所以氏族的觀念也得弄出一個系統來。久聞吳子馨先生的金文氏族疏證之名，但是這種工作非經過一番傳說的整理以後，引用材料時是很危險的。第五才說到禮制的問題。除掉禮經以外，周禮同兩戴記及先秦諸子中所提到禮制的地方，大半是一種理想制度。其中雖有不少先秦實現過的禮制，而大部分出於漢人的推測和塗改。儀禮的寫定，恐怕也在孔子之後。所以研究上古史者要明白先秦的真禮制，也不能拿着三禮直鈔，應該另外用一種方法做一部禮書通故之類的書，把其中的理想的派別和事實分得清清楚楚，然後真正的上古史纔會實現。這種工作也是迫切之至的。總上所說，都歸入上古史引論的預備工作。然後着手作上古史大綱。這部大綱也不是草草的擬成

題目，把材料配搭上就算，應該有很雄厚的後盾。這後盾，就是上古史長編。如下列的範圍：

第一，年歷篇

第二，地理篇

第三，氏族篇

第四，語言文字篇

第五，民俗篇

第六，社會組織篇

第七，政制篇

第八，學術思想篇

第九，工藝篇

第十，文學篇

這十篇的長編是以事實為根據的，要把中國上古時代的實況寫出來。例如說語言文字吧，應該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產生和發展的規範，以及兩者的逐步關係，整個的研究出來。又說社會組織吧，決不像文獻通考一類的書，把材料堆上就算，務必將中國上古的經濟情狀同社會構造的關鍵闡明。諸如此類，決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前幾年吳子馨先生作殷周之際歷譜推證，同金文歷朔疏證，金文疑年表諸書，頗有許多人反對。我以為這是不對的。吳先生有錯誤的地方，後人可以補正，但是說離開歷法來研究古代的年歷却斷乎不可。我覺得吳先生的工作就是年歷篇所必經的階段。他的功績是不可輕視的。在我提出來的十篇之中，就算吳先生把第一篇做到了幾分。其它氏族篇，如吳先生的金文氏族疏證算是一個底子；語言文字篇，如唐立先生的中國文字發生史算是一部分的工作；地理篇，如錢賓四先生的周初地理考算是一種意見。其它簡直沒有人問津。本來這種工作清代學者已經給我們不少的幫助，然而距離我們理想還很遠。第一原因，清代學者中除掉晚期的幾個人如吳大澂，孫詒讓，及王靜安師三人以外，可以說看見新材料太少。雖然偶有所得，也都要重新改造的。第二，他們的議論和見解大都窄隘，往往為古人所朦蔽而不自覺，雖王靜安師也所不免。這是時代所限，無可奈何的。我們生在崔康幾人之後，又經顧先生不斷的努力，才知道上古史應該分開兩步工作。那知當今之世，還有人說仰韶彩陶是以黃帝顓頊時的丹書作權輿的。這豈不是又鬧鄭康成的把戲，今古雜糅，越弄越糊塗，這還了得！所以我們現在作文章，最要緊的是不可貪多，尤其要緊的是肯割愛。不要自矜淹博，不分青紅皂白，一齊拉上。我們的工作多得很，不見得會替古人圓謊就算真本領。譬如上面所舉的十篇，略取其二三，也够我們辛苦了，何況全部的上古史呢？這十篇長編作成之後，才是我們的真正史料。然後根據這些史料作成有系統的故事式的新史，這才是我們理想中的上古史大綱。但是有人問，照此說來，這部上古史大綱到什麼時候才得成功呢？我以為至少也得等到這部上古史引論出來以後，才有相當辦法。如果將就的來寫，也要假手顧頡剛先生一類人物。否則恐怕又來一部新帝王世紀，豈不是白費力氣嗎！

末了，我又想起一句話來。最近有人身為研究中國史者，而說研究歷史是無關民生日用。這話如果是有意搪塞人家的，那也罷了。若是真心實意的話，我就

要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了：這就是自暴自棄。假定說研究歷史真是無關民生日用，他一定把民生日用看得太窄了。歷史正是民生日用的寫照。如果人類真是沒有歷史的話，我們的一切將全失所依據。因為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有歷史意義在，否則，這人便是冥行妄作。一個人的行為若使不管過去與未來，你想還有價值沒有？而且一個人有了正確的歷史觀念，才能真正了解什麼叫做民生日用。否則，這民生日用太不堪設想了！所以說我們研究歷史，就是為這民生日用。創造正確的歷史，就是把這民生日用更加深刻化。古史辨的意義是企圖發現中國上古史的正確觀念的總集，五冊以來，此志不懈，所以敢在此地說上這樣幾句話。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北平圖書館

劉節。

自序

現在距離編輯古史辨第一冊的時候，差不多已十年了。時間真過得快！但是性急的人們已嫌其慢，曾有人責問我道：「你研究古史爲什麼到今還尋不出一個結論來呢？我們真是等不及了！」這是實在的，十年的數目，在個人的生命史上已是一個長時期了，一個人能活幾個十年呢？能工作幾個十年呢？可是，話又說回來，學問原不是某一個人的專責，也不是某一時代的特有任務，乃是一種含有永久性的分工合作的共同事業，除了同時代人的同聲相應之外，前輩老死，後輩還該接上。一個人的智力才力固然是有限的，但像接力賽跑一樣地前進，智力才力便成了無限的。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中，十年算得了什麼，還不是一瞬眼嗎？

我的編輯古史辨的動機，並不是想把它當做自己的著作，乃是要它做成中華民國學術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彙編」；要使人讀了這部彙編，可以有幾個清楚的問題梗在心頭。問題自我發，固然編輯起來湊手一點；即不自我發，祇要和古史有關係而已經討論了些時候，我也樂於搜集。書由我編固可，即不由我編亦可。上次出的第四冊，就是羅雨亭先生（根澤）編的。他本來編的是諸子叢考，我看他的體例和古史辨絕相類，就請他加入。出版之後，許多人覺得詫怪，說：古史辨爲什麼不由顧頡剛編了？我覺得這種態度未免胸懷不廣：學問非財產，何必私有呢！古史的園地寬得很，應當做的工作多得很，竭顧頡剛一人之力也不過耕得百畝，何必把那些不耕之地也佔攔了！現在這第五冊，上編討論的是漢代今古文文學的本子問題，下編討論的是漢代今古文文學的學理問題中的一個（也許是今古文文學的中心問題）——陰陽五行問題。在這兩編中，我自己雖有些文字編入，但問題則不是我提出來的。今古文的本子問題，清代學者已討論了好久，但到民國，除了崔驥甫先生（適）在北京大學大家不甚了了的課堂上揚些垂盡的火燄之外，差不多已經絕響了。至於近來熱烈的討論，則由於錢玄同先生和錢賓四先生（穆）的倡導。陰陽五行問題是梁任公先生提出，而劉子植先生（節）繼承的。我和這些師友們常在一塊，當然要受些他們的影響。我久覺得這些問題是研究漢人的古史說時的先決問題，所以就將這十餘年來的討論文字集成這一冊，好讓同志們細細地咀嚼，再求深入，去獲得一個結論。當去年編纂時，似乎分量不算太多，但現在印成一看，這冊書已厚得利害。即此可知中國的學術界，近年來實在不能說沒有進步；祇恨遭逢的時代太壞，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無法安心工作，所以僅得如此，否則成績一定超過現在十倍。倘如天之福，接過了這樣重重的危難，還不至於亡國滅種，願將來生在昇平世界裏的人們用了憐憫的眼光

來看我們這種宛轉於生死不得的環境中勉強做成的工作罷！

這冊書出來時，一定有人討厭它，說，「他們又在鬧今古文問題了，真頭痛！」他們以為今古文問題是一種門戶之見，是主觀的爭霸而不是客觀的研究。所以一提到這個問題，這人不是站在今文家的立場上來同古文家為難，就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場上想來壓倒今文家。他們永是這樣想：不做今古文家就沒有討論今古文問題的需要。這是有證據的：幾年來我們發表了些不信任古文家的議論時，人家就替我們加上了「新今文家」的頭銜了。我覺得，而且我敢決然地說：抱這種態度的是祇會因襲傳統的見解而不肯自動天君的人，或是但會耳食而不能用目視的人，現在我們應該起來打破他們的成見。無論如何，今古文問題總是一件懸案，懸案是必須解決的。這個問題所以鬧了好久而不得解決，固然有一部分是因從前參加討論的人以為家派門戶應當存在，他們感到離開了家派就無法解經，所以自己祇得偏袒一方面做立足點，而另一部分則因這問題麻煩，恐怕把是非落到自己頭上，相率袖起手來，髣髴沒有這件官司似的，以致祇有讓家派色彩濃重的人去幹。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和他們截然不同了：我們已不把經書當作萬世的常道；我們解起經來已知道用考古學和社會學上的材料作比較；我們已無須依靠舊日的家派作讀書治學的指導。家派既已範圍不住我們，那麼今文古文的門戶之見和我們再有什麼關係！我們所以在現在提出今古文問題，原不是要把這些已枯的骸骨敷上血肉，使它重新活躍在今日的社會，祇因它是一件不能不決的懸案，如果不決則古代政治史，歷法史，思想史，學術史，文字史全不能做好，所以要做這種基礎的工作而已。古人的主觀爭霸，何害於我們的客觀研究！我們的推倒古文家，並不是要幫今文家佔上風，我們一樣要用這種方法來收拾今文家。至於這件懸案的不能馬上解決，那是自然的，天下哪有這樣輕而易舉的事！一部晉代的偽古文尚書，它的來歷既極不光明，它的材料又全有出處可尋，它的文章更是做得千篇一律，分該一出來就打倒，然而它畢竟延了一千五六百年的壽命。懷疑它的，從宋朝發難，到清朝完工，也經過了七百多年。做一件實實在在的工作，未有不艱難的。漢偽古文比了晉偽古文，作者既複雜，時期又加久，方面又加多，然而比較的材料反減少（晉偽古文出在古籍已凝固的時代，任何古籍都可拿來作比較；而漢偽古文則是出在古籍未凝固的時代，作者所用的材料有許多已看不見，有許多古籍的本身已受它的竄亂，須一條條地剔出，而剔出時又舉不出積極的證據來），其工作的艱難何啻十倍。就使工作的人增多，用的方法也好，可以縮短年限，也決不是一百年以內可望完工的。到那時，不但我們不在世，連我們的下一輩也不在世了。大家怕聽這種話嗎？倘使怕的，你們應當退下來，讓我們好好去做這種不求近功的工作，你們不必站在旁邊說冷話。倘使不怕，那麼，北山愚公說的「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你們應當用這種的精神幹去，讓後世的人來稱頌你們的功績！

本來，漢代的經學無所謂今古文。「古文」這個名詞，是西漢末的劉歆提出來的。「今文」這個名詞，是古文經師給舊時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加上去的，因為古文家自樹一幟，與舊有的為敵，逼得他們不能不合成一派，於是真有了今文家，這個名

詞的出現大約已在東漢了。(史記儒林傳有「安國以今文讀之」一語，係普汎的述說，不是家派的專名。)拿宗教來比方：中國古代本有許多零碎的民間信仰，想不到有聯合的一回事。自從佛教傳進，它是有組織的，收得許多信徒，給原有的民間信仰以嚴重的威脅，於是這些零碎的東西也團結於一個組織之下，名之曰道教。佛教彷彿古文，道教彷彿今文。實際今文在先，然因其組織在後，故其得名亦在後。距今四十九年（光緒十二年），廖季平先生作了一冊今古學考，把今學和古學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又說古學為孔子壯年之說，今學為孔子晚年之說，在先秦已有此二派：因為他的話好像公平，所以這書風行一時。其實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過了九年，廖先生又做了一種古學考，主張「今學傳於游夏，古學張於劉歆；今學傳於周秦，古學立於東漢：非秦漢以來已兩派兼行」，這是很對的，但因這書流傳不廣，大家不知道。）現在把我的觀察說一個大概。

漢朝初年的君臣本來不曾想到表章經學，高祖罵儒，絳灌無文，一切因襲秦制，一件事情沒有有勢力者的提倡就會衰頹了下來；加以楚漢之間的大亂，民不聊生，享有安定的讀書生活的能有幾人：所以漢初六十年間真可稱為『經籍道息』。史記說，「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鼂錯傳），這是實在的情形。待到天下承平已久，人民有了錢想尋求些知識，國家有了錢想創立些制度，然而那時除掉儒家保守的幾部古先聖王的經典之外是沒有什麼可以依據的，於是訪經師，立博士，孔子的經書就與漢朝的政治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為了要求完備，所以免不了雜湊。固然有幾個老師宿儒，像申公伏生之流，但既由國家提倡，羣衆一窩蜂擁上去，當然發生了供不應求的現象。因此，西漢的經師雖是二三等角色也能特立一個學派；他們沒有一定的宗旨，沒有系統的學說，解經的話就隨時變，隨人變。我們祇要看韓詩外傳的著作方法，王式對昌邑王的教授方法，便可知道他們是發議論和講故事的成分多，推求經義和解釋經字的成分很少，因為他們原是要『通經致用』而不是要『通經識古』的。又看孟喜得了候陰陽災變書，便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趙賓持論巧慧，說是從孟喜得來的，孟喜也承認了，及至賓死，沒有人能講通他的話，孟喜又否認了：可知那時人所要求的是新奇可喜，因為惟有樹新說纔能開新派，開新派纔有立於學官的希冀，所以就用了立異的手段來搶地盤。（穀梁之於公羊，就是如此。）又看申公本但教詩，但有了那位學穀梁春秋的瑕丘江公以後，他就變成教詩與春秋了；韓生亦但教詩，但有了那位通易的他的後人涿郡韓生以後，他就變成易學勝於詩學，著了易傳藏於家了：這可以知道那時人為了裝點自己的身分，會行使影戲老牌子的詐術的。漢書儒林傳贊說得好：「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益祿利之路然也」。上層階級「勸以官祿」，下層階級就儘向這「祿利之路」跑，所以「支葉蕃滋」就是由「一生吃着不盡」的誘引上來的。他們祇想自出心裁，激起社會國家的注意，然後可以開出新科目，他們哪裏想到要在同一的目標之下設立共同遵守的科條，用齊一的步驟來解經呢！

西漢學者讀書是最少的，他們祇消用三年的工夫通一經就可入仕途，若通兩經以上

便算淵博了。在這種風氣之下，當然造就不了大學問家。到成帝時，文化日高，儒者秉政，於是求遺書於天下，命劉向等做校讎批判的工作；後來又命劉歆續作。劉歆家學的根柢既好，加以天資的聰穎，又得到這樣一個博覽的環境，一定可使學術界放大光明。但不幸他生在那時，他不能客觀的表章遺文，使後人見古書的真相；而祇有主觀的改造舊籍，使它適應於目前的時勢。這依然為「通經致用」這個觀念所誤。話雖如此說，然而我們也須知道，那時如不影戲牌子，塗上致用的色彩，恐怕根本就沒有表章遺文的可能。任你喊破了喉嚨，人家誰來回頭睬你？現在發見了殷虛甲骨，新鄭銅器，所以開動全世界的視聽者，正因今人的歷史觀念突過前人的緣故。若在那時，單說「古東西，好材料」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拍上一個偶像纔能收號召的力量。例如殷虛甲骨，不要說時代待考，須要說這是武丁舉了傳說之後，祭祀上帝祖宗，傳說親手刻上去的；新鄭銅器，不要說是從無名氏的墓裏挖出，你不妨說這是子產死了之後，家人把他日用的東西拿來殉葬的：那就有了經典上的大價值了。但既經拍上了偶像，必得做幾件假古董竄亂在內，把所託的人的姓名寫上，行事記上，纔可算作證據：因此又要偽造文件。劉歆當時在秘閣讀書，見到了左丘明的國語，覺得它記載春秋時事十分豐富，大可作為春秋經的輔佐；又見許多零篇碎簡的逸書和逸禮，覺得其中有許多珍貴的材料，也可作為書經和禮經的補遺：他希望把這些東西公開，教學官子弟都得讀到，實在是他的好意。如果他的動機確是如此，我們真該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幸他處在這個時代，不託古竟做不成事。他祇得說：左丘明做的是春秋傳，他是孔子同時人，而且是同志，寫的最得聖人之意；逸書和逸禮是魯共王在孔子壁中發得的，也是孔子的原定經書。用孔子的大帽子來維持這三部書，自然有了立於學官的必要理由。然而當時的博士們不願意他的勢力衝進了他們的藩籬，起來反對他，說：尚書二十九篇是已經完全的，用不着拿不相干的東西來補缺；左氏本來不是傳春秋的，也無須請他來解經。因此，在哀帝之世，這補經增傳的運動竟未成功。到平帝時，王莽柄政，他和劉歆是老朋友，纔讓他達到了這目的。因為劉歆所表章的經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以他開創的一個學派叫做古文學派。

劉歆爭立幾種古文經傳，我們承認他是一番好意（雖則也許為的爭地盤），但他的偽竄是一件確然的事實。固然以前攻擊他造偽的是今文家，但既經是事實，那麼就使非今文家也該得承認。我說這話，或者還有人懷疑，我祇得引些書來證明。漢書劉歆傳說，「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僅此數語可見（一）這部書是劉歆從秘書裏提出表章的，（二）把左氏傳來解釋春秋經是他所開創的，左氏傳的章句義理是由他定的，（三）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是他「以為」出來的。崔暉甫先生說：「傳自解經，何待歆引？歆引以解，則非傳文」，這是没法答辨的質問。至於說魯共王從孔壁裏挖出來的逸書逸禮，我們可以用康長素先生的方法，拿史記漢書的兩篇共王傳來比較：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	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聲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這真奇怪：為什麼漢書全鈔史記，却多了「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的一件事呢？固然也可以說：司馬遷沒有採訪周勃，他脫漏了，所以班固替他補上。然而孔壁裏出來的東西劉歆說是「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牽到了孔安國身上，史記就有材料了。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可見司馬遷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但這古文尚書祇是孔氏的家傳而不是共王所發得；也沒有什麼古文逸禮，否則司馬遷為什麼但說「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呢？即此可見劉歆之言，是把共王的好治宮室和孔氏的家傳古文尚書拉湊在一起，而成就了這一件新的故事。

劉歆所建立的還有一部毛詩，一部周官。漢書藝文志用的是劉歆七略的材料，志裏說，「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又說，「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見得這兩部書都是經過河間獻王提倡的。不但此也，漢書儒林傳還說「賈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見得左氏傳是已由河間獻王立過博士的（這不知是否根據劉歆的材料）。我們現在再用康先生的辦法，把史漢的兩篇河間獻王傳文提出一校：

史記五宗世家	漢書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這一比較，顯見得漢書增加的更多了。司馬遷是一個『考信於六藝』的人，他作史記原是想繼續春秋的，他的書裏用的左丘明的記載這等多，為什麼獻王立左氏春秋博士這一件事他又不知道呢？他的自序裏說『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他對於文獻既這般注意，智識又這麼多，為什麼獻王「得書多與漢朝等」這一件重要事情他卻一些也不提起呢？這又分明是影射了獻王的「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而造出來的了。

劉歆既經造了假古董來開新文化，爲要使得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時代的需要，作鼓動有勢力者護法的方術。於是王莽要做「攝皇帝」，左傳中就有「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之文。王莽要做「假皇帝」，逸書嘉禾篇中就有「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的話。王莽要以土德舜後接受火德堯後的禪讓，左傳中也就有「其處者爲劉氏」，「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金天氏有裔子曰昧」諸條。王莽要自居正統，就會創作世經以別正閏。王莽要制作禮樂，就會「發得周禮以明因監」。王莽要什麼，劉歆有什麼。所以王莽未作皇帝以前，劉歆作的是「義和，治明堂辟雍，典儒林史卜之官」，及作了皇帝以後，劉歆作的是「國師」，他總是包辦了文化事業。

古文經傳既爲劉歆所建立，要是沒有幫他的人，他的勢力也不會廣大的，因爲這種新出的東西誰懂得呢！所以平帝元始四年，在起造明堂，辟雍，靈臺的時候，就「爲學者築舍萬區；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王莽傳上)，這樣的文化統制政策是多麼的可怕！劉歆一個人，憑你本領大，也大不了多少。但有了這幾千個（「千數」當是以千爲數，否則當云千數百人）趨炎附勢之徒，替各種古文經傳及劉歆學說大吹大擂，「古文學派」立刻成立了。當時他們怎樣在未央宮廷中「正乖謬，壹異說」，可惜材料無存。但看許慎說文序中說「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就可知古文已在文字界中取得了第一流的地位，而且是頗經改定的。推之其它經籍，亦當以新出來的爲第一流無疑。

其後王莽的政權雖倒墜，但劉歆的學術却没有跟着他失敗。我們祇要看漢書十志，就可知道他在學術界的建樹是怎樣地根深柢固。律歷志說，「元始中，王莽秉政，……徵求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義和與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於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這是劉歆在律，度，量，衡方面的工作。律歷志又說，「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這是劉歆在歷法方面的工作。禮樂志說，「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我們在劉歆傳中知道他是主治明堂辟雍的，這是他在禮樂方面的工作。食貨志云，「莽……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

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贍，與欲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有五均，……」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這是他在食貨方面的工作。郊祀志說，「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臣謹與……劉歆……等議，皆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又說，「莽又奏言，「……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羲和等……議：……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黃〕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甚盛矣，這是他在祭祀方面的工作。郊祀志又說，「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這是他在帝王系統方面的工作。五行志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摯仲舒，別向歆，……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又說，「孝武時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這是他在災異說方面的工作。藝文志說，「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前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這是他在整理文籍方面的工作。無論典章制度，學術思想，他幾乎沒有不參加的。班固雖有時也不以他爲然，但敘述事蹟仍不得不採用他的書。他真像如來佛了罷，爲什麼孫行者總跳不出他的掌心？他這個人的學問事業，方面之廣，見解之銳，作事之勇，哪一件不夠人佩服？我們絕不像從前人一樣，因爲他幫了王莽篡位就把他看作亂臣賊子；我們誠心稱他一聲「學術界的大偉人」！章太炎先生曾說孔子以後的最大人物是劉歆（廬書），這句話真不錯。但他的學問的卓越是一件事，他所表章的書的真偽則是又一件事，我們不能因爲佩服了他就原恕了他！

當哀帝時，劉歆要把四種古文經傳立學，博士們反對，他寫給他們一封信，說，「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藏於秘府，伏而未發」，這些話雖很有疑問，但足見這種書都是秘府裏的東西，外邊看見的人是很少的，當然沒有什麼師承。他又說，「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這是說秘府裏藏的古文經，其一部分有與今